

釉上紅彩盤的身世之謎

翁宇雯

本院收藏數件器表書滿回文的「釉上紅彩盤」（圖一），其中一件作品於同一箱匣內，還附有回疆風格的布套與四體文字釋文紙一張，彷彿賜予這件紅彩盤華麗衣著與身分證。



明代中國深受伊斯蘭文化與藝術的浸染，不只在作品上呈現伊斯蘭工藝造形與紋飾，也有許多作品在器表書有回回文。這種書寫回回文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明武宗時期（一五〇六—一五二二），並以青花類型居多，而書有回回文的釉上紅彩器則是

相當特殊的一群。這類紅彩盤器表無紋，至多以弦紋開光作為文字區塊分隔線，盤心與盤底都書寫回回文字，連款識都以流行於明代西北回族的「小經文字」撰寫。就目前統計，這類回回文釉上紅彩盤至少有八件，本院藏有五件。（註一）其中一件還附有

布套與長方形釋文紙。（圖二）

偽造的身分證

目前無法得知藏於它處的三件作品是否原來即有布套或文字，但從本件作品編號首字為「故」，亦有原始編號「天—四四四」，可推知屬清宮



明 正德描紅回回文盤 盤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释文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明 正德描紅回文盤 盤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舊藏，並貯藏於紫禁城的乾清宮。（註二）因此，布套與释文紙等附件至少在文物來臺之前即已存在。

這一長方形释文紙長四十四公分、寬二十五公分，約是一張A3尺寸的大小，應是先將長邊對折成近正方形後，再以三等分作四折，成為一小方形，放置於該盤盤心。攤開此張释文紙，左右各畫一圓，右上並以楷書題寫「碟外面」與「碟裡面」，原來這張释文紙是以等比例方式複製了〈正德描紅回文盤〉盤心與盤底之開光與文字，而且不僅僅照實抄錄盤上的波斯文字，也加列了器表回文文的漢、蒙、滿文譯注。（圖三）乃是以清代通行的主體族群文字標注此件紅彩盤的身分。释文紙上四體文字對照請見附表。

〈正德描紅回文盤〉的盤心與盤外壁文字分別擷取《古蘭經》第十四章第七句與第三十五章第三句，而圈足內以波斯文寫出「大明蘇來曼國王所製造」，意同「大明蘇來曼年製」。從其它類似作品比對，可知蘇來曼國王即是明武宗正德皇帝（註



圖二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及其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印度葉形盒〉與其布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清宮。欽此。於九月二十九日，將玉雙鳩蓋碗一件配回子布套承進，交乾清宮，迄。」認為這些帶著邊疆少數民族風格的布套，是清高宗於乾隆五十一年起吩咐所作，有些布套來自回疆，有些則是宮中照著樣子用回子布仿作。（註五）若以此件〈印度葉形盒〉比對，則布套極可能亦為同時期製作，再次印證了四體釋文紙的製作年代，並可以將時代範圍縮小在乾隆晚期。

謎樣的紅彩盤

為紅彩盤穿上屬於伊斯蘭玉器的花布套，且加上黃籤條注明「回子磁盤」，也顯現皇帝或主事者認為這件作品與回疆有密切關係。陳玉秀曾引用清初穆斯林學者劉智《天方性理》一書，認為紅彩盤上的同心圓紋「○」象徵伊斯蘭藝術的幾何圖案，也隱含了真主阿拉永恆存在的特性，並且認為運用在紅彩盤的圓形紋可為信仰加持，具有符咒功能。（註六）目前我們無法得知，在紅彩盤的製作年代——明代中葉正德朝，是否已經深諳圓形紋的魅力，但為紅彩盤加上彩衣



圖四-1 〈正德描紅回回文盤〉布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2 布套局部紋飾特寫

三），因此這件作品其實是以波斯文轉寫了官窯上習用的「大明正德年製」，是官窯款識當中十分特殊的一例。然而，此釋文紙的漢譯部分卻將款識寫作：「大清蘇來曼所書經文」，而且滿、蒙文字亦跟隨漢字譯出，造成連環錯譯的狀況。由此推測此釋文紙為清朝時製造，但清代官方設有「回回館」等翻譯機構（註四），竟會將「大明」譯成「大清」，如此離譜之錯誤，實在讓人玄想。



圖五 〈正德描紅回回文盤〉布套與黃色籤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異國的花衣裳

這張彷彿各國語言身分證的釋文紙與〈正德描紅回回文盤〉皆放入一件米黃底色帶紅花綠葉紋飾的布套中（圖四），布套邊緣縫有黃色束線，能將布套束口，並於黃線末端縫上黃色籤條一張，上有墨字楷書「回子磁盤一件」。（圖五）

這件帶有回疆風格的布套與本院其它清宮絲質錦袱的質材有所不同，令人好奇這布套是否為「本土製造」？幸運的是，此件布套恰與院藏伊斯蘭玉器〈印度葉形盒〉的圖案款式完全相同。（圖六）

鄧淑蘋女士曾就本院伊斯蘭玉器的布套進行研究，她根據檢閱的《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結果，指出《活計檔》中於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匣裱作記有：「二十七日：太監鄂魯里交青白玉詩意撇口碗一件、青白玉碗一件：。乾清宮傳旨著將詩意碗一件配錦袱時做上等，其青白玉碗一件、甘黃玉碗一件亦配錦匣袱時做次等，雙鳩耳蓋碗一件配回子布套，得時交

與釋文紙的清代，應該對於此件紅彩盤的「魔力」有所意識。

在此，藝術史學者傑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在討論萬曆皇帝的肖像時，對於人類學家傑爾（Afrid Gel）的一段評述，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思考這一件器物與其「身分證明」的意義：「傑爾使用「魔力」作為表述是正確的，但他忽略了一些對此魔力具有貢獻的重要成分，他所高度讚賞和研究的技藝，只有處在一套信仰體系和從直覺上認同這些概念的社會當中，才會具有『魔力』。」（註七）

因此，前文對於文獻和實物的梳理，就揭示了院藏紅彩盤在乾隆朝的重要意義。與那些隨附回子布套的伊斯蘭玉器一樣，都因為政治上的宣稱和需要，外壁書有「回文」的器物來到了宮廷之中，被擬人化地喻指一種萬方來歸，重譯來朝的意象，鄭重其事地收藏於紫禁城中。

結語

正因為這件「明代」的紅彩盤，同樣承載了「清代」乾隆朝的政治期待，而前述「身分證」上的錯譯現象

〈正德描紅回回文盤〉釋文紙 漢滿蒙回文字譯注表

圖	位置	漢文	滿文譯註	蒙	回	回文漢譯
	盤心(款)	能知天恩 敬承禱祝 益降以福 設行惡事 弗能成恩 殃咎即至	abkai (天的) kesi (恩) isibuha (至到了) be (把) s afi (知道了) gingguleme (恭敬地) alime (承取) gaifi (拿取了) jalbarime (禱祝) hengkišeci (若連叩頭) ele (更加) kesi (恩) isibumbi (要到) aika (若) ehe (惡) baita (事) yabufi (行了) abkai (天的) kesi (恩) be (把) alime (承取著) muterak (不能) ereci (自此) sui (罪) waile (罪) isibumbi (要到)	tngri-yin kesig kürtegegsen-i/ medeged, kiciyenggüilen küliyen aburad/ jarbariju mörgöbesü,neng kesig/ kürtegemüi, kerbe maru üile/ yaburad, tngri-yin kesig-i/ küliyen ese cidabasu, kilin / yal-adur kürügülümüi./	ﻭﺍﺩﺗﺘﻦ ﺭﻳﻜﻢ ﻟﻦ ﺷﻜﺮﺗﻢ ﻟﺮﻳﻨﯩﻜﻢ ﻭﻟﻦ ﻛﻪﺭﺗﻢ ﻧﺎﻉﻠﻰ ﻟﺸﯩﺪﯨﺪ	當時，你們的主曾宣布說：「如果你們感謝，我勢必對你們恩上加恩；如果你們忘恩負義，那麼，我的刑罰確是嚴厲的。」（《古蘭經》第14章第7句）
	盤心正上	上	dergi (上東)	degedü 上、高、古	ﻗﻞ ﺍﻟﻠﻪ	（順序：上、下、右、左） ﻗﻞ ﺍﻟﻠﻪ ﺳﺒﺠﻪ ﺗﯩﻠﺮﻙ ﻭ ﺗﻪﻟﻰ 「至高無上的阿拉所說」
	盤心正下	天	abkai (天的)	tngri-yin 天的	ﺳﺒﺠﻪ	
	盤心正左	維	wasimbuha (降下了)	barulrsan 降下了		
	盤心正右	命	hese (諭旨)	jarlir 諭旨	ﺗﯩﻠﺮﻙ	
		(未譯出)	(未譯出)	(未譯出)	ﻭ ﺗﻪﻟﻰ (「與」+「全能的」)	
	盤底中	大清年蘇 賚曼所書 經文	dai (大) cing (清) ni (的) forgon (時代) de (於) sulaiman (蘇賚曼) fala (盤) de (於) nomuni (經的) hergen (字) arahangge (寫了的)	dai cing ulus-un car dur/ sulaiman bila dur nom-un tüstüg/ bicigsen anu buyu. /	ﺩﻯ ﻣﯩﻨﯩﻚ ﺷﻪﺳﻠﯩﻤﺎﻥ ﻋﻤﻠﺮﺕ ﻛﯩﺮﺩﻩ ﻟﯩﺴﺖ	「大明(小經文字) 蘇來曼國王所製造」(波斯文)
	盤外壁上	天下之人 敬祝於天	abkai (天的) fejergi (下) urse (人等) abka (天) de (於) gingguleme (恭敬著) jalbariha (禱祝了)	tngri-yin dooradu arad tngri/ dur kiciyenggüilen jarbariju,/	ﻛﻤﺎ ﻗﻞ ﺍﻟﻠﻪ ﺳﺒﺠﻪ ﺗﯩﻠﺮﻙ ﻭ ﺗﻪﻟﻰ	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的
	盤外壁左	天降之福 咸當領悉	isibuha (到了的) ele (所有) kesi (恩賜) be (把) sakini (知道吧)	tngri-yin dooradu arad, tngri-yin/ kürtegegsen-i/ kesig-i oroi tegen süstügledügei. / qamur amitan dur jayararsan anu, cöm / tngri-yin soyorqarsan,	ﻳﺎﺑﯩﻬﺎ ﻧﺎﺱ ﺍﺩﻛﺮﻭ ﻧﻪﻣﻪ	（順序：左、下） 人們啊！你們應當銘記真主所賜你們的恩惠，除真主外，還有什麼創造者能從天上地下供你們嗎？』（《古蘭經》第35章第3句）
	盤外壁下	衆生秉彝 皆天所與	geren (衆) ergengge (生靈) de (於) salgabume (天賦予地) banjibuhangge (所生了的) gemu (皆) abkai (天的) buhengge (給了的)	qamur amitan dur jayararsan anu, cöm / tngri-yin soyorqarsan,	ﺍﻟﻠﻪ ﻋﻠﯩﻜﻢ ﻫﻞ ﻣﻦ ﺧﺎﻟﻖ ﻏﯩﺮ	
	盤外壁右	天下衆庶 當感天恩	abkai (天的) fejergi (下) urse (人等) abkai (天的) isibuha (到了的) kesi (恩) be (把) ujude (於頭) hukšekini (感激吧)	tngri-yin dooradu arad, tngri-yin/ kürtegegsen-i/ kesig-i oroi tegen süstügledügei./	ﺍﻟﻠﻪ ﺻﺪﻕ ﺍﻟﻠﻪ ﺍﻟﻌﻈﯩﻢ	偉大的阿拉所說的是真理。

就值得討論。從翻譯最基本的「信雅達」要求中，「阿拉」被轉為「上天」，「大明」被譯為「大清」，可信度上確實不足。事實上，滿蒙文的譯法其實也頗有技巧，以盤底款識小經文字「大明蘇來曼年製」為例，滿蒙改譯後為「大清時期蘇賚曼於盤中所寫的經典文字」，改寫了「製作時間」與「命令者」（或製作者），應該並非程度不足的「錯譯」。從政治的期待來解釋，可以推測這是有意為之的改譯，以合於當朝的需求。

進一步來說，紅彩盤「身分證」上的滿、漢、蒙、回四體文字並列的形式，也可以在乾隆朝多元統治的脈絡下來理解，這樣的形式，大同小異地呈現在乾隆朝的宮廷藝術當中，可見於器物、唐卡，到最顯眼的碑文。多元統治在這個時代所展現的樣貌，正是將原本無關於政治、屬於血緣、文化上的人群區分，提升並列到政治的維度來看待，姑且不論滿、漢、蒙、回在人口比例上的巨大差異，就是清王朝，一定還有許多不同「民族」未被列入這一公開展示的清單，

因為紅彩盤上的文字，被辨認出屬於「回」這一政治單位，才被納入運作清王朝政治表達形式，以四體文字並列的形式展現，從而將政治滲透到宮廷最深處。文字翻譯根本沒有失誤，而是必須為之的政治正確。

以書有「大清蘇來曼年製」的釋文紙，加上與進貢至清代中國的伊斯蘭玉器相同的布套，無怪乎於早期出版的《故宮瓷器錄》當中，還將之定名為：清官窯〈描紅回文盤〉。（註八）這件紅彩盤顯現了由明至清代中國伊斯蘭教的思想發展，同時也載負了由明至清不同製作者與收藏者的期待與想像。或許，還是要回到傑西卡羅森所言：「只有處在一套信仰體系和從直覺上認同這些概念的社會當中，才會具有魔力」（註九），而這些過去的歷史脈絡在析縷條陳的娓娓道來中，才能發揚積澱在歷史傳統中的迷人光芒。

釋文紙中滿文與蒙文部分由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林士鉉教授協助譯出，特此致謝。^{註釋}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 另三件紅彩盤分別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與科威特博物館。有關八件釉上紅彩盤的介紹與分析，請見拙作，〈談正德官窯瓷器上的外文款識〉，《故宮文物月刊》三〇八期，二〇〇八年十一月，頁五〇—五九。
- 嵇若昕，〈故宮文物的ID〉，《故宮文物月刊》二二一期，二〇〇五年十一月，頁八〇—九一。
- 「蘇來曼」可能是身為穆斯林的明武宗之「經名」，有關正德官窯與帝王伊斯蘭信仰的關係，請參拙作，〈真主的追隨者：明武宗及其官窯回回文器皿〉，《故宮學術季刊》二九卷二期，二〇一一年十二月，頁一四七—二二一。
- 劉迎勝，〈《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十月。
- 鄧淑蘋，〈乾隆、嘉慶時期伊斯蘭風格玉器東傳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二一卷第二期，二〇〇三，頁一六七—一七一。
- 陳玉秀，〈幾何圖紋探索—淺談明清伊斯蘭教思維與圖紋的運用〉，《故宮文物月刊》三〇八期，二〇〇八年十一月，頁八八—九五。
- 杰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萬曆皇帝畫像的載體作用〉，《祖先與永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四九八。
- 《故宮瓷器錄—清九》，青花、彩瓷，雍正、乾隆（未刊稿）。
- 前引註七。